

前 言

为了响应党的“抢救文史资料”的号召，我会一些有阅历的委员和人士，以饱满的热情，几年来，孜孜不倦地写了不少亲身经历的“三更”材料，由于各种原因所限制，长期积压，未能问世。今天，《第一辑》资料，才草创付印，特向作者、读者、深致歉意。今后，将继续整理汇编，广泛征集，不定期地发表。

文史资料工作，是一件有深远历史意义和现实教育意义的重要工作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，实事求是地记载下来，作为史料保存，传之后代，并发挥它的宣传教育作用，提供历史科研资料，使人民群众了解我们伟大祖国各个时期的真实情况，激发爱国主义精神，以利于革命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，对于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，将起到积极的作用。

由于我们的编辑水平有限，调查研究不够，缺点和错误，在所难免，敬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——编者

1983年12月1日



北方局的成立和破坏

1922年震惊全国的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反对封建的罢工运动，被直系军阀吴佩孚镇压后，革命运动虽暂时消沉，但人民群众的革命思想，却继续高涨起来。23年吴佩孚所支持的曹錕大总统倒台后，西北军冯玉祥脱离直系军阀，改称国民军，进入北京，并驱逐宣统溥仪于天津，而吴佩孚亦被迫离开北京，走往武汉。皖系军阀段祺瑞即以内阁总理代行总统职权，号称段执政。在曹錕任总统时，一批在京国民党议员，纷纷南下，在广东建立非常国会，选举孙中山为总统，反对曹錕的不合法的贿选政府。段祺瑞上台后，欲巩固自己的地位，曾邀请孙中山回北京共商国是。孙中山于24年冬到达北京，因沿途劳顿，于25年3月病逝北京。

孙中山到京时，曾主张召开国民会议，解决统一问题；段则主张善后会议。而国民会议是由人民选举代表，善后会议是由势力派选举代表。段别有图谋，欲巩固现有权力，所以不同意孙中山的主张，协议遂告破裂。可是全国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怒潮，滚滚而来。在五四运动时期，最有声望的陈独秀、李大钊、胡适、钱玄同、刘半农等，是知识界的有名人物，尤以陈独秀所主编的《新青年》

刊物，为全国青年所爱读。他所作的文章，抨击当时的政治和时政，是异常的深刻，尖锐，幽默的，他是北京大学文学长，北大校长蔡元培，是主张学术自由的、只要学识丰富，言之成理，即聘为学校讲师或教授。如清末遗老辜鸿铭，拖起长辫子，带着书僮，拿着水盆，摆着臭架子，在讲内上课，蔡元培是不计其数。陈独秀和李大钊二人，在私交上学术上，思想上是比较好的。李大钊是北大图书馆长，曾留学日本。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陈独秀被选为总书记，陈南下到沪，主持党中央工作后，即将北方党务，交给李大钊领导。当时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，知识分子集中地，各校学生要求进步和革命的思想，是极普遍的，急需党的领导。尤其在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，上海罢工罢课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运动，掀起全国革命的浪潮，震惊中外。当时，为了迎接大革命的到来，北方局即成立。由李大钊负责，河北、山东、山西、陕西、河南、东北各省，以及京津和长辛店，京汉铁路的工人组织，由北方指挥。当时社会人士，对共产党领袖，都以南陈北李的称誉。北方工作的重点，是摆在北京的。北京市地委会，亦于是年成立。地委书记李渤海，山东人。陈毅来到北京，他从法国回来不久，是协助北方局工作的。他是四川乐至县人，不久离开北京南下了。

地委会下设三个支部，和几个直属小组，即东

城支部（北大）西城支部（中大）南城支部（前门外
湾）工农）师大直属小组，法大直属小组。清华直
属小组。协和、大朝大属北大支部，辅仁大，燕大属清
华组，医大属师大组，交大，工大属法大组。三人以
上即成立小组，三组以上成立支部。北大和中大支部
的党员最多，当时我是中大支部书记，女师大，艺专
校属我支部。支部设书记一人，宣传组织干事各一人
支部以下分小组，每组设组长一人。北京学生联合会
的常务代表和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市区委员，系半公
开的组织，我党参加两机构的人员，则由地委会另编
小组，派人指导。师范大学范文澜和一些有社会地位
的人，亲划入小组，直接同上级接头。23年我才知道
刘宁一以中央社记者的身份，在社会上活动，他是
清华大学的学生，他是否参加小组或直接受上级领导，
我还不能十分了解。26年秋，余泽洪代表上海学联会，
由沪来京，协商组织全国学总会的问题，我介绍他同
北京学联会负责人接洽，均同意组织全国学总会，但
北京学生主张学总会应设在北京，认为北京的学生运
动有一段光荣的历史，如五四运动。彼此意见分歧，
未有结果。经我汇报地委向北方局请示，以党中央在
上海，学总会应由中央统一领导，使学生运动系统化。
当时党的工作，是重在宣传和发展组织，并在各组加
强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。如共产党宣言，辩证法唯物
论，马克思资本论等，在讨论中，提出三大哲学，唯
心论、唯物论，唯识论等书的研究，而于辩证唯物论
的正反合题，更加深入，坚定党员（都是大学生）对

共产主义的思想，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意志，更加坚强起来，至于民主集中制和纪律问题，政治问题，工作行动，均有明确的研讨和指示。

记 26年陈延^年代表党中央来北京视察，报告国际形势、国内政治和组织发展情况，他说：“25年时全国党员约有一千名，随着形势的发展，党员的数量和质量，定有迅速的增高”。彭述之自认是党内理论的权威，有时来到北京讲说，如何工作，如何宣传，如何研究马列主义。陈绍禹亦曾来北京视察。26年，为了响应北伐军，党领导各大学师生，反对段祺瑞的善后会议，举行示威游行，行经天安门前总统府时，被段的警卫旅，开枪射击，打伤学生十余人，激起全国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学生运动，北伐军由广东出发，很快击溃吴佩孚军。占领长江流域，到南京时英帝国主义，由吴淞口开军舰多艘到南京江面，炮击北伐军。此时，直系、皖系军阀的军事势力，已濒临崩溃，奉系军阀张作霖乘机率军入关，赶走段祺瑞，张以大元帅的名义，执行大总统职权，并令参谋长杨宇霆率军沿津浦线南下，驱走孙传芳部队，占领沪宁地区。英美日帝国主义，因北伐军控制沿江各省，恐慌万状，急欲扶植奉军，以抗革命军，俟北伐军驱走奉军，占领南京上海后，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，与左派汪精卫政府对立，所谓南京政府，即国民党右派政府，主席是谢持，四川隆昌人，这是完成长江流域各省的军事胜利后，宁汉分裂时期。

此时，北方各省，仍在奉军控制之下，帝国主义

义主共
来政
保计
工
界
、
党
国
金
相
是
起
味
是
道
对
南
新
表
示
同
破
血
座
下
武
宣
会
议
普
学
商
界
路
帝
意
国
香
港
路
、
义
主
、
胡
洪
国
军
系
全
的
领
部
队
撤
帝
日
美
封
心
武
京
前
线
保
卫
工
衛
兵
團
除
匪
事
出

同奉系军阀勾结，给北伐军以坚强的抵抗。并对北京的学生和革命青年，给以残酷的镇压。28年夏，张作霖受英美日帝国主义的支使，搜查苏联大使馆，虽经苏俄大使加拉罕，以使馆地国际法规定，是受保护的，任何国家和任何人，不能侵入，张作霖搜查使馆，是违背国际公法的行为，向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，但无结果。在使馆内搜去北方局的文件和名册，并捕杀李大钊同志（用绞刑致死的）且按名逮捕我党工作人员、约20余人，处以利刃。记得这数十人中，有一姓欧阳的，他的父亲，是我国驻新加坡的总领事，得知他儿子被捕，即电外交部总长顾维钧设法营救，张作霖要救这个姓欧阳的，便在这张名单上欧阳的前面，用红笔一勾，20余名党员即被杀害，欧阳和以后数名，遂得救。王颂成是艺专校学生，在地委会缮写文件，他是获救的人之一。解放后，曾在重庆西南美术学院作院长。法大学生陈云臣是地委会交通，和陈云寿等都被镇压了。后又陆续逮捕多人，党外的革命青年也有牺牲的。此事件共计牺牲约30余人。其余的都纷纷逃回南方。

我因负重劳甚，致患严重伤寒症，（肠^和扶斯病）卧病^和医院，约五十余日幸未被捕。但病愈出院后，迁至宣武门外西河沿后铁厂，叙州会馆居住，不数日，有便衣探警数人到馆查捕，我藏在刘妈床下，黄昏时、越墙逃往师范大学化装赴津，由津乘海丰轮到沪。

此次事件，使北方局和北京市地委会一切组织，全部遭到破坏、数年来党在北京建立的基础，已被毁灭。这是党在北方最大的损失。

钟运栋写

1983年7月20日

悼代英在川南师范

1920年，我在叙联中校读书，该校是叙南十县三县联合成立的，它的前身是清末时的翠屏书院。1921年暑假，我行泸州，赴川南运动会，参加水棒^球集体操，由20军军长杨森部属川南道道尹王赞绪主持，这时正是悼代英作川南师范学校校长，他办学的声誉，名震四川。他曾向杨森进言，指拨川南各校校长，组织教育视察团，到京沪地区参观，以视察所得，作为今后办学指南，并提倡女子应有受教育的权利，主张男女合学，开风气之先。泸州的忠山，原是一片荒坟^野，荆棘丛生之地，他领导学生开垦植树，数年后，花香鸟语，绿柳成荫，已^已成为秀丽的风景区。无不歌颂悼代英之功。

川南师范系清光绪时所创建，宣今已有百余年^年的历史，原名南屏书院，设山长一人，掌理院务，有学田四百余亩，在纳溪县境内，山长必须由科^举出身或进士担任，后改为川南师范学^学，民国元年改为川南公立师范学校，经费由川南二十^五县负担，取录学生，必须按照所^所经费多少而定，哪^哪县经费负担多，录取名额就多，少则少取。校内^内课程，则分组系，有文史组，数理组，艺体组，由^由学生选^选，川师是四川最早的第一个学府，名望最^最高。

1920年校中^中学生教师，看见上海商务印书^书馆发行的东方杂志上悼代英作的文章，对教育局问^问题，阐述甚详，有独到见解，群^群情洋溢，悼代英

桑川主持教育，初受到五四运动思潮的震动，思想比较趋向，意欲培植学生，为已所利用，将川师作为培养人才的基地。答应师生的要求，电聘恽代英来校，恽由湖北乘船，溯江而上，船到泸州码头，全校师生上船欢迎，询问谁是恽先生，他背着一床被盖，衣着旧兰布长衫答道：我就是恽代英，大家狂欢地拥他进入学校，请他任教务长，他就在教务室搭床安息，住了一个星期，很少出门，每天饮食，都由炊事人员送去，他在室内拟了很多有关校务和教务的提案，第二星期一，他召集全校教职员会议提出早已拟定的提案，让大家讨论，将事前准备的卡片，发给每人一份，规定两分钟通过一议案，凡赞成的，交出卡片，十几个提案，很快的全部通过，各期都照议案执行。校风大整，杨森部即任命他为川南师范校长，并将前校长调离学校，担任富顺县长。恽于暑假之便，会同教师到成都和川南各县宣讲政治和有关革命的事情。于返校时，即着手清查前任校长经费，查明已亏挪四百余元，他挂着布包，步行到富顺，向前任索取欠款，如数筹足现款，交其带回，他即携此款赴沪，购买图书仅四，俟其购运回校，杨森军已退出泸州，川师校长，已由新到部队的军人，另委人员接替。他将图书起运至校，即在图书馆住宿，每天看书写字，以观动静。有时忽呼学生到礼堂听讲，各班学生在教室上课之际，忽呼呼唤，立即行动，由教室悉然而出，争先恐后蜂拥达到礼堂，屏息而立，静听讲课，无一私语者。恽代英拉长演讲，对各门科学，有独到的见解。而于政治经济社会以及革命思想，尤有精辟的认识和阐发。他这

种行动，已引起驻军的注意，弄得新校长手足无措，甚难维持校内秩序。驻军同新校长商量，逼迫他校外居住，迁出后，仍随时于校外，通知学生到忠山听课，全校学生无一缺席者。当地驻军派他到第三监狱禁闭，他仍在狱中坚持已见，每常于监洞门，召集学生听课，这样便被迫离开四川，被遣送湖北原籍，临行前，全校师生到码头送行，校长停立船头，只简单的说几句“临别赠言”的话：“学生门，你们一定要做好事，切不可做坏事，如果你们做坏事，人民是要咒骂你们，唾弃你们，我也要打死你们。”

话完，轮船已蠕动，汽笛长鸣，震撼全市，他向送行人招手，数百支手亦向他招手致敬。好像说：

再见，在革命的道路上我代英在川师校已留下革命的种子，该校是四川共产党的发源地，地下党员也多，昔年在黄埔军校当教官的聂楚女是川师校的共产党员，她走后，留下革命的遗产，是光辉的，伟大的。1924年我在上海补习，代英常在上海大学讲政治和马列主义，曾见过他多次，他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，25年五卅事件发生，我曾参加过这次伟大革命运动，离开上海到北京去了。后来，听说他在沪西作工人运动，不幸被敌人杀害。

注：1932年，我回川奉省教育厅厅长张钰之命，来川师作校长，在成都时，已闻听到川校学生爱闹事，情况复杂，不好办理，但我立下决心，要将学校办好。到校后，摸清底蕴，知道学生中蕴有国民党的左派，就是汪精卫所领导的改组派，是前

任校长刘希武所发展的。也有青年党的组织，是醒狮派曾辉的党羽，曾是青年党的领袖，隆昌人，留法学生，有国民党的左派所谓西山会议派的组织，右派首领游持，隆昌人，是川南师范早年的学生，宁汉分裂时做过南京政府主席，该校学生派别复杂，互相争尊。1933年二刘战争，刘文辉失败，放弃泸州，由刘湘军接管，即在泸设置清共委员会，县长兼主任，副主任一职由军部另委钟世朋专任清共会欲派兵来校搜查，我以校长身份，阻止了这事，不料忽于星期假日，发生军警，泸州军警，在市内逮捕我校学生赵云祥等数人，夜晚学校点名时始知此事，我到县府查询，并提出抗议，次晨钟世朋来会我，向他质问，“为何逮捕我校学生事前不通知我，你们是有意侵犯学校，至于情，都不合，况且这几个都是我校勤谨好学品德兼优的好学生，绝不是共产党员。”几经交涉“我以校长身份出具保证，才得以释放出狱。我的前任校长是刘希武，后任校长是王诉我任两年有余35年就离开了。

钟伯明

1983年4月5日写

在革命和反革命中间

一段回忆录

吴以祺

五〇年秋，我由宜宾到重庆，打算通过筠连同乡邓止豪先生（当时任中共西南党校教育长）的关系，找到一个工作。党校在浮屠关^{（注）}，刚走到两浮支路，便遇到前中央大学老同学艺术系高材生画家屠左虹。我向他说明了来意，他说他就在党校工作，愿意引我到邓止豪家里去。我们且走且谈，话就拉长了。

他感谢我解放前在泸州时对他的帮助很大，这话使我感到惊奇。我在泸州时，只不过因同学关系有时和他^{（注）}街，有时一同看看电影，有时一齐进出跳舞厅而已，这算什么帮助呢，他随即解释说，解放前他在泸州搞地下工作，担负泸州地下党的组织重责。和我交^{（注）}往还，可以减少许多麻烦，同时人身安全多些保证。他又说后来情况紧张的时候，是陈商先生（即任专员）护送他上船才走脱的。他又放开嗓子说：“你们的付司令刘天敏，也是我们的同志，他现任四川某军分区司令员。”

他这一说，追忆往事，我恍然大悟了。

解放前三年中，我由苏州地方法院调泸州地方法院任推事。淮海战役后，我通过考试领得律师证书，作好应付时局的准备。四九年三月间，国民党泸州“保安司令部”“司令”罗国熙（军统特务头子之一）以“戒严司令部”的名义，调我兼任“保安司令部”军法官，此后两个月，我介入了革命的刘副司令和反革命的罗司令斗争的波涛中。

到“保安司令部”这个阴森森的环境，使我感到很不习惯。这儿人与人间只有高声的斥责，没有和悦的商谈；只有怒目的相视，没有笑容的表露。惟有一人是和蔼可亲的，即便是副司令刘天敏先生。他常常到我办公室，问我工作忙不忙，

些生活习惯不习惯，家庭情况如何，我也只有在他面前，才说一点心里的话。

我当时面临着一个巨大的任务，就是叫我审讯关押在泸州白塔寺中由一连宪兵看守的所谓“奸党嫌疑犯”。“罗司令”叫我去到办公室，严肃地要我对这些人“认真审讯，从严处理”。不两天，“罗司令”到重庆去了，由“杜秘书”代行处理日常事务。

“罗司令”刚走，副司令来催我办案了。我立刻拿出一些卷宗，详细审查，反复阅读。这些人既未杀人放火，也未奸淫估掠。而且什么犯罪证据也没有，仅在“移送书”上有一些“形迹可疑，身份不明，言语支吾……”的论断。这叫我根据什么从严处理呢！至于是不是共产党，我在当时有我的政治观点：大学时代长期学的是西方的“议会民主政治制度”，天天在讲多党制，两党制。很知道在法国，常常一家人中各参加一个政党；在英国，有人父亲是保守党，儿子在工党；在美国，有人哥哥在共和党，弟弟在民主党。执政党和在野党间的竞争，吵闹，谩骂，在西方国家里是司空见惯的。国民党与共产党也应当如此，只能有文字上加言论上的争辩，而不应有人身的侵害。我把我的见解去向刘副司令陈述，请他对办理这些案子作出指示，他的回答是“依法办理”，还有一个答复是：你是军法官，你看应该怎样办就怎样办！”

按照档卷的顺序，第一次取出几个卷宗，整个上午，详细审查，反复研究。在以前的“审讯记录”上，提问很多，回答很少。既无证言，也没有任何物证。简直没有什么犯罪依据可循。下午提出卷宗中的七、八名“奸党嫌疑犯”到庭，凭我四年的专攻政治法律，三年的司法实践，仔细审究这些人的谈话内

事，观察他们的行动举止，觉得他们都是些善良的人，正直的人，经过深思熟虑，便提出我的处理意见。我在“签呈”上写道“某某等犯罪证据不充分，拟具保开释……”。连同卷宗先送到副司令处，副司令同意了，在“签呈”上写了“拟如拟”三字。最后送到代折代行的杜秘书处（解放后《川南日报》登载杜的秘密身份是军统西南局专员），隔了一夜，第二天才批上“如拟”二字。我当即释放这七八人。第二次、第三次和以后的多次，我都是如法炮制，每次副司令都是同意的，“杜秘书”也迟迟地批了“如拟”二字。就这样，“罗司令”走后二十多天中，今天放十个，明天放八个，我一口气放走了“在押人犯”二百人以上。

二十多天后，“罗司令”回来，把我叫到办公室，大发雷霆，说我“办案草率，随便放人”，当即派了“王科长”（据解放后《川南日报》载明此人系军统特务）陪同我一齐审讯其于伙犯”。

一场闹剧开始了，我信守的“审判独立原则”受到破坏了。这位不请自来的“王科长”也居然和我并坐在法庭上。等到“人犯”提到，查点姓名后，我逐一提出问题，“王科长”未经我同意，也在发问。庭下的人不知回答我的问题好还是回答他的提问好；书记官也不知记我的好还是记他的好。法庭秩序是闹哄哄的，书记官的记录也是一塌糊涂的。审讯后我的处理意见是“交保开释”，“王科长”的意见是“重新审讯”。争执之后，最后“王科长”似乎让步了，我便在“签呈”上写了“某某等罪证不足，拟开释”等字，副司令这回仍然是同意的，最后送到“罗司令”处，批示的是“人犯还押，重新审讯”。

这一记“耳光”打痛了。我办案三年以来，这是第一次“

大伤面子”，但我也仅认为是破坏了我的“审判独立原则”而不知自己的工作，已被监视起来了。以后几天的审讯中，“王科长”在法庭上坐而不言，只是“旁听”。最后的结果，“罗司令”的批示都是“还押重审”。

我呆不下去了，把辞职的打算告诉了副司令，他回答说：“以棋兄，你离开学校不久了，还有些书生气，干下去。”

又一个斗争序幕拉开：“司令部”的组织，起了一变化，在副司令的下面，设了一个参谋长。这是“罗司令”在刘副司令面前树立的铁壁铜墙，把刘副司令“围困”了。新来的参谋长姓雷，（解放后《川南日报》说他也是解放前来的），此后事无大小，“参谋长”把守第一关，障碍重重了。从此，在军事法庭上，“王科长”也不来了。送上去审批的案子，刚送“参谋长”处，都是原封归起”每个案子都批上“重新审记”四个字。

我实在呆不下去了，写了辞职书呈送上去的第二天，新军法官就从重庆抵达泸州，还算给了我面子，没有对我“撤职查办”。离开司令部之前，我和两个人握手告别，一个是刘副司令，一个是我的助手陈书记官。

往事值得回味，刘天敏先生当时陷于特务包围中的处境是非常险恶的。“司令部”组织的改变，充分说明特务头子“罗司令”对他的怀疑和布防，使他动弹不得。然而他一直未受到迫害，除了刘副司令本人老练之外，可能他也有复杂的社会关系，陈离先生兼任司令时，他就是副司令的。据老屠说他解放后任四川某军分区司令员，如果他还健在，我很想见一见他，还愿见一见屠古红同学，同他们畅谈往事。

陈离先生卸任后，未回成都，长期住在泸州。老屠说他主要是为了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而长住泸州的，他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和

湖北省副省长，这不是偶然的。

当时白墙寺中的“在押人员”是四五百人，还剩下的三百人最后是怎样处理的，有查明的必要。

这点回忆，或有助于泸州写地下党活动史时参考。

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三日

写于筠连

红军长征过沐爱 (回忆片断)

巍巍边陲小堡，红军千载流芳
一路摧枯拉朽，王室风雨飘摇

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，一支由余泽鸿率领的川南游击队，经：珙县、新场（今维新公社）于1935年5月29日破晨攻克沐爱，去云贵全师。

沐爱当时为高县二区（区公所设沐爱“禹王宫”今机械厂地址），地形险要，易守难攻。红军在攻克沐爱之前，探知地方团勇（自卫中队）潘松培部，在高沐爱十里许的“土地坝”设防严守，不宜强攻，乃采用迂回包围战术，沿“鹤嘴”山两面夹击，守军一触而溃，败荒而走。潘松培见势不妙，偕同各分队长（冯若武、王圆璋）弃甲曳兵，退叶家坝向巡司场方向狼狈逃窜。

土地坝一战中，红军战士一名壮烈牺牲，一名女战士光荣负伤，牺牲战士解放后移葬沐爱烈士陵园，至今犹活在沐爱人民心中。

红军进入沐爱当天，官府及豪门巨户均闻讯先逃。区公所仅有一名“文书干事”邹必成看守。红军攻打区公所时，邹狗急跳墙，从后门跳越门院漏网。

红军入场时，街上百姓曾一度荒凉。但很快秩序恢复，大群大群穷人围着红军战士听宣传“红军为穷人打天下”的革命纲领和红军纪律，大铺小铺照常开门营业，各安其所，穷苦人民更是眉飞色舞，积极向红军告密，协助红军惩治恶霸。中午时，兴隆街（今沐爱粮站附近）刻薄成家、著名地主财迷李仲云三十多年“人壁”被砸开，搜出许多银元、铜元、铜币及鸦片，悉数分给穷苦人民；中华街哥老会巨头万佐臣，地头蛇袁槐夏家，相继搜出金银、布帛等无数，并宰杀了他们好几头肥猪分给穷人食用；花线街（今新华书店右侧）地主兼反动资本家徐云青的绸缎铺被穷人打破，也清算了他的万贯家资。

高场三里许的高家黄家（今南坪大队）是当时的盖场粮户，家

12
有千程，昆仲三人（黄太安、黄德明、黄子周）为富不仁，万人称恨，因红军用兵神速，粮食、家财搬动不及，被穷人们开仓强拒，一举瓜分了他们的剥削物资。一时街上街下，到处都是人流，到处都有人群发出“红军好”、“朱毛好”、“共产党好”的欢呼声。是夜，除红军女战士驻入“二女小”（高县第二女子小学，为沐爱公社社址）外，其余全部在檐前屋下住宿，未越民房一步。30日清晨，红军早餐后继续行军，经望天坡下镇州（今政治公社），夜宿落木溪（今沐爱公社）。

路过镇州时，镇州乡乡长周光鼎曾亲率团勇抵抗，但红军高歌猛进，未发一枪一弹胜利占领镇州。

红军在镇州“打青济贫”，又惩罚了两个大恶霸地主。周明三（当时仓库主任周光汉之父）被罚款壹百元（大洋）交群众分亨；郭一帆（即后来参加伪国大竞选的郭仕弘之父）因拒绝罚款被红军带走，行至贵州边绝路自尽。

当时，我年幼无知，在一家私塾里随龙仲英先生读书，不懂人事，更不懂得谁是真正的好人，谁是真正的坏人。但我从人群中发现，很多人在红军走后都感到忧心忡忡，言谈中或在面容表情上都流露出一种说不出的忧郁。红军走了，天又要黑下来。今朝（过去）那竟成了“多余的担心”。因为红军走后，仅仅只十四年时间，沐爱人民在1949年的冬天又迎来了红军，还迎来了全国人民的大解放。

马国

李孝治

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五日